

里来，了解自己走过的曲折和坎坷、艰难和险阻、成就和辉煌。数千年积累的中华文明的精粹，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思想宝库。一个对于自身文化具有自信的民族，也是具有自身文化反思和批判能力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也构成我们文明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文明也有某种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①，尚不论这种断言是否真实，这种分析体现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也是文明的传承和更新所需要的，文明在发展中面对传统痼疾也要勇于革故鼎新、超越藩篱。

文明说到底并不是说出来和写出来的，是靠实干拼搏出来的。正像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②。中华现代文明不可能建立在传统经济和社会的基础上，它必须有高度物质文明的支撑，这就要求进行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不仅要实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也要在信息化、国际化的大潮中走在前列。实现这样的目标，除了实干拼搏，别无他途。任何领域的进步，都要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

开放和包容是一个古老文明得以振兴和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华文明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形成过程中以海纳百川的精神特质吸收不同文化的精粹。中华现代文明的塑造，也并不是作为西方文明的对立物。西方文明为创造人类历史的辉煌贡献了智慧，中国也通过学习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获得了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无论什么文明，都不能自视为具有替天行道或教化万民的“天职”。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本质，不应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应是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世界上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仍可以大行其道之时，获得文明生存、发展和振兴的权利，也首先要具有对抗强权的实力，否则一切美好的愿景，都非常脆弱。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创新时代，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新成果井喷式涌现，驾驭新的巨变和裂变成为考验人类智慧的关键，也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了新的契机。中华现代文明的塑造，也必须守正创新，在传承和创新中发展，突破在技术上、制度上、观念上束缚创新的桎梏。一种文明，无论曾有怎样的辉煌，如果故步自封、妄自尊大、排斥异端、恃强凌弱，都终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中被抛弃。

[作者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北京 102401）。]

文脉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探索

陈云松

进入 21 世纪，随着新文化形式的不断涌现，全球文化权力结构和各国文化主体性意识的演化，文化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当前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过程，以及西方文化理论在非西方社会的拓展检验。然而，非西方社会主体视角的缺失和历时性思维的不足，使得现有的脱胎于西方社会学的文化理论难以对中国社会文化过程进行解读、解释和预测。特别是，中国的文化社会学亦沿袭了西方主流文化社会学的当代聚集，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脉络缺乏系统性关注。而问题在于，与其他文化形态相比，中华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纵深。就此，唯有扎根中国情境，追溯文化脉络，将“文脉”作为中国自主的文化社会学的知识体系构建方向，方能承载文化传承与自主知识创生的时代使命。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提出“文脉社会学”，即一种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时空结构、聚焦中华文化对历史和当代社会形塑的自主的文化社会学知识体系。

①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田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

②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载《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 92 页。

一、文化社会学的西方视角局限：地域与历史

文化社会学 (cultural sociology) 在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学科定位从其英文表述就可见一斑, 与仅将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的社会学” (sociology of culture) 相比, 文化社会学更关注文化作为一种自主力量对社会过程的影响, 并不将文化视为社会结构的产物。^① 当代文化社会学的西方视角缘起于社会学领域的“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大众文化的繁荣以及民权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影视、流行音乐等文化娱乐产业的成功, 缩小了文化这一“软”领域与经济等传统“硬”领域之间的界限; 少数族裔和女性主义者的发声, 也使西方社会学家意识到, 单纯依赖掌握在权力主体手中的物质因素来解释世界, 容易陷入忽略差异的简化主义的陷阱。“文化转向”和文化社会学的兴起, 正是对社会学传统结构性范式的质疑与反思, 旨在通过文化解释, 深入理解现代社会中复杂而多样的身份表达、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

文化社会学的核心思想可以用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对韦伯理论的再发现来概括: “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② 这一纲领性思想指引学者们对涂尔干和韦伯等西方社会学先驱进行重新解读, 并发展出两种文化研究取向: “作为文本的文化”和“作为结构的文化”, 分别对应拥有自治逻辑的语言, 以及能够强化行为意图的符号, 恰好呼应了西方文化社会学代表人物杰弗里·亚历山大 (Jeffrey Alexander) 对强文化范式和弱文化范式的讨论。^③ 亚历山大所领导的耶鲁学派作为当代文化社会学中的中坚力量, 强调文化的自主功能^④, 积极探索社会世界中的符号转型, 其研究对象涵盖与种族、性别、性取向、宗教等文化身份, 涉及影视、艺术、表演等文化形式的消费审美和文化意涵, 特别关注互联网流媒体、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推动的文化抗争趋势。在文化意义愈发多元、复杂、割裂的当代社会背景下, 对符号表征这一“高潮”现象的深入剖析, 有望迅速切入当代西方社会的“阿喀琉斯之踵”, 通过主观意义的实践来弥合社会冲突。

以耶鲁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社会学引领了文化研究的新功能主义革命, 赋予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新维度。然而, 这也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 当文化的自主性被置于客观性之前时, 理论和诠释便容易受到当前研究语境下的话语权力的影响。这种时刻可能发生变化的个体经验性结论, 往往并不具有普遍性, 从而导致文化社会学在跨国比较研究上的不足。^⑤ 特别是在对非西方国家文化现象的研究中, 忽视不同国情和本土文化特征的问题已经无法通过简单的视角转移来解决, 后殖民主义的阴影依然在文化社会学的范式中徘徊。在这种背景下, 如果直接将西方文化社会学以主观意识为主导的理论框架及其关注的种族、移民等文化问题移植到中国研究中, 必然会导致意识形态的偏颇, 且容易忽略中国文化研究中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

非西方社会主体视角的缺失也意味着, 当前的文化社会学理论难以有效应用于中华文明这类具有悠久历史脉络且未曾断裂的文明形态。西方传统的文化研究领域受到共时性思维的影响更为深刻, 人类学家往往倾向于通过某一特定时刻洞察所有历史时期的文化全貌, 以“悬停” (suspended) 着的共时性意义宇宙来解释当下的世界。^⑥ 在社会学中更是如此, 由于社会学学科起源于西方工业社会, 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具有相对窄化的历史视野, 使得其历时性回溯通常只是解释现代性“共时”的路径。^⑦ 即便文化变迁研究特别强调的历时性视角, 也因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的多次断裂而成为经验的片段。历史证据的碎片叠加能够启发我们理解当下, 但并不一定反映其在文明变迁过程中的真正作用。这也是西方文明在关键时刻往往不依赖历史进行决策, 以及未能理解中国以长历史视角看待当代问题的原因。^⑧

总体来看, 西方文化社会学在面对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时, 存在以下两个主要局限, 因而无法直接移植理论和概念进行分析:

① Wendy Griswold,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2008.

②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5.

③ 周怡:《强范式与弱范式: 文化社会学的双视角——解读 J. C. 亚历山大的文化观》,《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 6 期。

④ Jeffrey Alexander, “Cultural sociology or sociology of culture? Towards a strong program,” *Culture*, vol. 10, no. 3, 1996, p. 1, pp. 3–5.

⑤ Mark D. Jacobs and Lyn Spillman, “Cultural sociology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 discipline,” *Poetics*, vol. 33, 2005, pp. 1–4.

⑥ William H. Sewell,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2005, p. 182.

⑦ Anthony Giddens,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6.

⑧ 类似的观点见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London: Penguin, 2012, p. 28, “无法想象在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一位现代领导人会援引千年前的战略来作出一项牵动国家的决策”。

1. 地域局限。西方文化社会学长期以来以自身的社会体系为基础，试图推广普遍性理论，但对非西方文化的关注严重不足，缺乏跨国比较的视角。即使偶尔涉及非西方文化现象，往往也以西方主体的视角进行观察，未能全面理解当地文化传统和历史脉络。这种视角或将非西方文化实践视作“他者”的奇观，或仅以西方价值观判断其“正确”与否，而忽视其在本土文化中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2. 历史局限。作为聚焦现代性的社会学的分支，西方文化社会学对历史社会文化现象的关注不足，且由于文脉传承的断裂，缺乏对自身文明更为纵深的追溯和对比意识。尤其在多元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下，西方文化社会学学者往往更关注当代社会复杂多元的文化身份和话语权力，并通过短期历史叙事的重构来顺应当代价值观需求，但这种分析方式往往忽视了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3. 静态局限。西方文化社会学偏重当代现象的研究，缺乏对历史文化的关注，从而放弃了对较长时期文化脉络发展的系统性认知，更难以理解古代文化形态对当代社会现象的影响和塑造。其研究多依赖于共时性视角，将当下的多元文化置于静止的现代性真空之中，呈现出一种“历史终结”式的自负。该视角无法基于历史经验理解文化传承演变的因果过程，也就无法深入当代文化现象的本质。

二、文脉社会学：扎根中华文明的交叉社会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①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经历过重大历史断裂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在多次朝代更迭和社会变迁中依然保持了连续性与稳定性，使得众多文化形式、哲学思想和社会习俗得以传承。这些持久、坚韧而鲜明的文化特质，正是构成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也必然成为建设现代文明的基础和根基。因此，对于中国文化社会学来说，必须向历史深处追寻其源头与脉络。只有在研究思维、对象、范围和深度上充分把握历史优势，承担历史责任，推动历史转向，才能构建中国自主的文化社会学知识体系，即文化社会学与历史研究交叉的“文脉社会学”。

对中华文化的追溯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主题。无论是透过“孝悌”“报”“人情”等现象对传统人伦关系进行思考^②，还是使用“贵货”“小邦寡民”等理论对其他社会的共通现象进行解读^③，抑或是采用“天下群”“道义”等思想对人类命运的未来作出指向^④，都反映出中华文化经典内容提炼为学术概念的巨大潜力，以及推广至世界文明的普适性解释力。“以古释今”的历史文化概念运用和“以古释古”的历史文化面貌阐释本应成为中国文化社会学的核心内容，通过探索历史过程中文化现象和实践演化，厘清文化传承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然而，以上的文化溯源集中于传统的关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等领域。尽管中国的文化社会学学者已经开始在中华文化塑造社会结构的自主性方面进行实证探索^⑤，但总体来看，仍然依赖西方文化社会学范式，多聚焦当代文化现象的社会作用，缺乏梳理文化变迁的历时性思路，因而难以实现基于中华文脉的知识创生。中国文化社会学亟需开辟“文脉社会学”的全新领域，深化文化解释视角与历史发展思维的交融，为社会规律的探索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洞见。

（一）文脉社会学的概念

文脉社会学是文化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交叉，聚焦人类社会的文脉演化机制及其对历史和当代社会的影响。“文脉”即为文化现象、思想和行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续与演化，也即延续性的历史文化过程的主干。中华文脉的千年延续，使得中国成为文脉社会学最重要的产生和发展之地。中国的文脉社会学旨在探索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文化脉络的形成，以及中华文脉对中国历史和当代社会结构特征、价值体系和发展进程的深刻影响，是构建具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学科领域，能够为理解中国社会提供深厚的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 翟学伟：《报的运作方位》，《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周飞舟：《慈孝一体：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学海》2019年第2期。

③ 梁永佳：《以中释外：基于文明互鉴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1期。

④ 景天魁：《“天下群”与人类道义秩序》，《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29日，第12版。

⑤ 胡安宁：《传统文化观念、资源交换与社会团结：一项社会学的经验考察》，《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2期；朱迪：《“宏观结构”的隐身与重塑：一个消费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理论支撑。

（二）文脉社会学的内容

文脉社会学的研究内容超出西方文化社会学的传统关注，不仅对当代文化现象进行溯源分析，还深入探讨历史文化现象特别是跨时间、跨空间的文化现象，旨在还原并理解这些文化在历史中的演变轨迹及其对社会的持续塑造作用。文脉社会学在既有的现代性研究基础上，引入文明发展的时间维度，以动态、跨时空的方式追踪文化形态对各个时期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其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文脉传承与延续性文化共识的形成。文脉社会学从历代延续并活跃至今的核心文化载体（如汉字、典籍、传统节庆、民间信仰、礼仪制度等）出发，研究这些载体中蕴含的思想与相应的实践行为如何在不同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独特的文化共识，进而成为国家结构与社会认同的基础。同时，关注这些文化元素在形成过程中受到的社会形塑。

2. 历史文化形态对历史社会结构的影响。文脉社会学探索核心文化载体、思想与行为如何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制度和价值体系，揭示文化形态在社会变迁中的持续作用。通过回溯历史探析文化形态如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相互塑造，形成特定的社会特征，从而帮助理解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机制和驱动力。

3. 延续性的历史文化进程对当代社会的影响。通过历史思维，文脉社会学分析具有独特性和延续性特征的历史文化进程在当代社会中的表现与重构。重点揭示文化在规范社会行为、构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确立道德准则方面的持续影响力，探索文化如何与当代社会的结构和特征进行互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

（三）文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对于文脉社会学的具体研究来说，既要立足于共时性视角，从当代的角度提炼出各时期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要采用历时性视角，将文化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理解其变迁。特别是对于历时性视角来说，除了传统的历史分析和文本细读之外，还需结合统计计量方法和智能技术，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对文化趋势和分布进行量化分析，实现文化脉络的全景观察和结构性探索。具体方法如下：

1. 基于传统定量方法的文脉机制分析。经典统计计量分析，特别是在历时性视角下进行时间序列分析，能够研究结构性因素对文脉的影响，以及文脉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塑造。在当代社会分析中，关注当前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社会分层等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探索历史文化形态对当代社会的形塑；在历史社会分析中，探讨文化现象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下的历史变迁，分析其在不同时期的持久社会影响，能够揭示中华文明历程中社会与文化互动演化的深层机制。

2. 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文脉结构呈现。通过海量数字化文献等文化大数据（如谷歌图书语料库、《四库全书》等重要历史典籍），结合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对文化信息进行量化测量、主题归纳、语境提炼和结构分析，能够对文化意义和思想进行具象的捕捉。数智技术不仅有助于高效检索历史资料，帮助揭示未被充分研究的文化现象，还能生成海量社会行为数据。借助大数据，可以将文化现象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通过量化手段追溯其演化脉络，并研究其与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

3.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文脉梳理分层。借助 GPT-4 等大语言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和生成方面的优势，高效梳理、归纳复杂的文化脉络。大语言模型可从海量文本中识别主题、思想分支和语义关联，为分析各时期文化流派的分层结构提供自动化支持。大语言模型还可推测文化形态的变迁趋势，在跨时空语境中梳理出具有突出结构性作用的文化要素，从而更精准地分析不同时期的文化思想对社会认知与行为的深层影响。

4. 基于定性研究的文脉意义阐释。定性研究侧重对史料和田野的深入分析，通过对文化现象及其象征意义的阐释，重点关注文化符号在历史中的意义变迁。定性分析弥补了定量数据无法揭示的文化细节和深层关联，能够从共时性角度提炼出具有时间和文明普适性的文化理论，从而更深入地探讨文化思想内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四）文脉社会学研究案例

在阐明文脉社会学的定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之后，本文以中国古代精英阶层文化生产与国家政治结构的互构为例说明文脉社会学的具体研究思路。中国国家精英的产生与文化才能的选拔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唐代将“诗赋取士”纳入科举考试科目之后，更凸显了文艺创作在人才选拔标准中的突出地位。该举措直接促成了唐诗的繁荣，而诗赋文化创作及其承载的价值观也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形成了“双向生

产”的独特社会文化互构模式。

对于该研究案例，前文提到的四种文脉社会学研究方法均能有效应用。首先通过文化大数据（如《全唐诗》《旧唐书》《新唐书》）获取历史背景、诗赋内容、诗人科举和品级等资料，接着运用无监督学习算法提取诗赋的主题和上下文信息。利用大语言模型，可以对诗赋结构和诗人特征进行深入学习，识别和归纳诗赋的不同种类、诗人的社交网络，从而高效梳理文化思想发展的演变脉络。在关联探索方面，因果分析等统计方法被用于分析科举和仕途等个人际遇，以及重要历史事件（如边境战争、内部农民起义）等社会宏观因素对诗赋思想和主题的塑造作用；有监督学习预测方法可以测量诗赋中蕴含的价值观对政治结构形成的具体解释能力，并进一步拓展能够塑造社会和国家文化因素。最后，定性分析能够补充和阐释诗赋的深层意涵，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双向生产”模式如何促进唐代文化的繁荣与国家体制的完善：

1. 国家结构促进文化生产。与西方贵族委托专业匠人进行创作以彰显身份和地位不同，中国古代精英，尤其是文官群体，往往亲自从事诗赋和书画创作，这些文化实践被视为个人文化修养与道德修养的双重象征，并在科举制度正式确立后被进一步视作精英阶层的合法文化。在唐朝，随着政治结构的变化（世家大族的权力归于中央王权），应试文学创作产生了“律赋”这一新体；在元朝，由于政治需要（证明王权的正统性），“古赋”重新成为科举考察的重要内容。^① 其中的延续和变化，受到国家权力和政治体制的强烈影响。

2. 文化促进国家结构生产。科举制度通过“诗赋取士”的方式，将擅长文学创作的士人群体纳入国家政治中心。士人群体对文学、书画、礼仪等文化形式的传承，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强大文化共识的价值体系，包括尊君重臣的礼义结构、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厚古重德的道德观念、自省慎独的个人修养等。这些文化价值观不仅影响了国家治理模式和权力分配体系，成为维护国家结构和政治认同的道德支柱，还强化了社会的稳定性与文化的连续性，为理解中华文明脉络、制定社会治理思路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三、文脉社会学的知识创生使命

文脉社会学以中华文化的传承性与独特性为基础，历时性剖析文化变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塑造，并将历史经验融汇进现代性发展的共时性视野，从而破除西方文化社会学“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主义迷思。通过丰富的本土文化传承和实践探索，文脉社会学不仅为文化强国的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还在全球文化语境中彰显中华现代文明的独特价值。文脉社会学的知识创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概念的创生。文脉社会学致力于从中华文明的丰富历史中提炼文化概念，作为分析社会现象的工具。无论是典籍中已经被提炼的“伦”“群”“孝悌”等经典概念，还是历史文化现象中新发现的规律，如士人群体与诗赋作品的“双向生产”，都能够启发对于中华文化独特精神内涵的深层次理解，从而阐明其在全球文明体系中的独特价值。而在特殊性之外，中华文脉所创生的概念同样能够适应不同的文化背景。《论语》中提到的“君子不器”强调君子应适应多种环境与需求，具备广泛的才能和品德，不仅局限于某一技艺，这与西方文化社会学的重要概念“杂食”（omnivorousness）所表达的对多元文化的包容非常相似；当“目”作品品鉴、品评之意，如南朝《世说新语》对人物言行特质进行评价，“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则与“品味”（taste）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体现了文化表达对于社会身份的重要影响。在含义隽永深刻的汉语语境下，文脉社会学足以产生大量精练的文化概念，兼具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和全球文明的普适性。

2. 理论的创生。文脉社会学理论创生的关键在于历史脉络分析与当代社会视角的交融，众多古代士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典范：清代诗人赵翼在《题遗山诗》中提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揭示国家动荡和兵戈战乱反而会激发作者的深切感悟，从而书写传世之作；欧阳修在其散文《梅圣俞诗集序》中感慨“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愈工”，反映文人困窘的人生际遇会化作笔下的情深意切或慷慨激昂。^② 这两个观点结合历时性追溯观察与共时性理论提炼，是典型的将社会结构、个体经历

① 许结：《科举与辞赋：经典的树立与偏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② 陈云松：《诗穷而后工——唐人生平际遇对诗作成就影响的量化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陈云松、句国栋：《国家不幸诗家幸？唐人诗作与时代际遇关系的量化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2期。

与文学创作相关联的文脉社会学理论。如今，借助文化大数据和智能技术，学者们能够分析海量历史文化典籍，寻找并验证类似的文化规律，以历史解读当代中国社会的特色文化现象。由此创生的理论框架还可以应用于其他文明形态，发挥中国文化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文明互鉴价值。

3. 话语的创生。中华文明历经千年传承并形成超大规模的作为文化载体的社会，并在视野高度、审美和思想深度上展现出独特优势。其文化精髓不仅体现在现象层面，更源于背后复杂的社会互动所孕育的文脉生命力。因此，以中国为视野，聚焦于社会进程与文化的互构关系，特别关注这种关系的传承与发展在当代全球体系中的定位与表达，为文脉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创生提供了新的机遇。例如，儒学所强调的“和同”与“中庸”思想源自古代社会治理实践，不仅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深远意义，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以中华文脉为主体，涵盖其变迁特征、规律与社会关联的话语体系，需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探索和对当代发展需求的回应，结合严谨的理论架构、科学的方法体系及深刻的价值判断进行学术研究。这种结合将中华文脉的高度和深度融入全球语境，使文脉社会学在全球文化社会学知识体系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多元文明的协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虽然起源于西方文化社会学的知识积累，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深刻需求，需要对中华文化历史进行现象溯源、规律发现和知识创生。文脉社会学这一“以史为鉴”的全新学科分支，承担着追寻中华文脉之源、探寻古今社会之理、启发当代中国之治的时代使命。为此，需要鼓励更多具备历史视野的文化社会研究，特别注重智能算法在把握文化脉络方面的重要作用。不仅通过历史的纵深视角理解当代社会中的观念秩序混乱、价值隔阂冲突、社会心态极化等现象，更以历史经验助力社会治理和价值观凝聚。作为中国文化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领域，文脉社会学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根脉，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关键需求，能够充分发挥学科优势，深化对“两个结合”的实践性理解，将中华文脉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有效转化为建设现代文明的具体路径。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视角下基于数智方法的社会风险评估与应对”（24&ZD16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云松，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

意识形态、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

周 怡

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高度稳定，是近 40 多年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两大标示。然而，如何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这一点却与国家意识形态、与百姓秉承的传统中国文化有相依的唇齿关系。自 202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提“两个结合”的文化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来，在不同场合的具体阐释及学习中，我们不断能看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两条宣传标语。宣传动员是这样，学理意义上“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之间确有其无法割舍的联系：或筛选、传承，或有创新发展之意。本文研讨这两个基本概念及其联系，并在此基础上从儒家大文化圈的东亚发展模式入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一、概念：意识形态与传统

意识形态（ideology）是指一种观念形态、思想体系。具体来说，它是观点、概念、信念及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最早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提出。^① 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的初衷是，为

① 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年。